

2303

盐边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盐边
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编委会编印

盐边县文史资料

第四辑

四川省盐边县政协文史资料编委会

一九九一年十月

2A50/01
盐边县政协八届二次会议文史
资料委员会

顾问：沈荫宝 谭绍春 王炎尧
主任委员：胡廷勋
副主任委员：罗鼎辉 付锡春
委员：李文光 罗克宣 张肇新
熊荣周 赵绪光
特邀委员：沈永康 刘治远 郑宗富
王良政

盐边县文史资料第四辑编委会

主编：胡廷勋
副主编：李文光 付锡春
编委：罗克宣 刘福荣 杨华荣

目 录

贺龙轶事.....	刘福荣 (1)
盐边历史沿革.....	张尔祥、郑德智、张肇新 (16)
回忆启文乡的清匪反霸.....	孙贤发、杨维之、赵绪光 (22)
盐边县的土地改革运动概况.....	张尔祥 (29)
西干校土改干部班同学参加盐边县土改工作.....	
纪实.....	王炎尧 (36)
盐边县禁烟肃毒简况.....	胡良图 (47)
盐边第二次平叛的保卫工作.....	胡良图 (61)
刘书母子其人.....	曹福俊 (64)
盐边县农村互助合作化运动.....	郑德智 (71)
盐边县大坪子自治区的建立情况.....	曹福俊 (77)
解放前盐边盗贼猖獗的根源.....	郑宗富 (81)
国统期盐边通货膨胀的身经眼见.....	熊兴周 (84)
昙花一现的官办民主.....	熊兴周 (86)
盐边早期土法造纸.....	杜克刚 (89)
道光年间盐边的木版印刷.....	杜克刚 (94)
六十年代盐边永兴乡农田水利建设概况.....	
.....	熊永鑫、张正仁、张荣斌、胡廷勋 (97)
从松明火把到耀眼的电灯.....	谭绍春、唐代忠 (115)
盐边地下水库会议纪实.....	罗克宣 (118)
盐边彝族农业今昔.....	付锡春 (122)

盐边交通事业的发展概况·····	王良政	(126)
飞跃发展的盐边县电视事业·····	李文光	(131)
盐边县的山蛭科研·····	潘夕观、胡廷勋	(140)
蓬勃发展的盐边税收事业·····	董启全	(149)
解放初盐边共和区的税务工作·····	杜海田	(156)
民主改革中的盐边县供销社·····	康之惠	(159)
盐边纸厂的崛起·····	魏国寿	(164)
盐边工商行政管理概述·····	章南才	(174)
盐边解放前粮政、田赋及征粮简况·····	张作云	(183)
民国初的鹿游箐小学·····	杜克刚	(190)
解放前夕的盐边县小学·····	田兴成	(191)
一辈子跟着共产党走——记原政协副主席章拉子 ·····	张宇林、胡廷勋	(197)
盐边民政中英勇献身的彝族姑娘·····	沈永康	(201)
他们为盐边人民邮政献身·····	王志林	(204)
回忆我的父亲王卿义·····	王安书	(208)
解放前盐边街道的三次整修·····	王良政	(213)
盐边民族商贸文化的传播者——民族马帮····· ·····	付锡春	(219)

贺 龙 轶 事

刘 福 荣

我的爷爷刘达五，字尊三，四川省会理县人，是老同盟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和讨袁护国战争，后来长期追随贺龙，当过他的高参，曾于一九二四年十月被贺龙派作代表，持贺龙亲笔信到广东去，和孙中山大元帅府直接取得联系。北伐战争中，他在贺部任过训练处长、团长，率军攻克宜昌，北伐河南，直捣开封。一九二七年，他随贺龙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时任贺龙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一师前敌指挥。南昌起义后，他随贺龙转战江西、福建、广东，在潮汕失败后，经香港、上海返汉口治枪伤。伤愈后，他又到湖南桑植找到贺龙军长，参加了贺龙新组建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在参谋处襄赞工作，开展扩大红军活动。一九二八年九月，部队在湘西石门泥沙遭到国民党反动军队偷袭，在激战中，第一师师长贺锦斋壮烈牺牲，爷爷刘达五双腿负重伤，贺军长在危急之中派人将他送往武汉治疗。伤愈后双腿已残废，他无法归队，便由一些故旧帮助，在汉口河街西南大旅社找到一个闲职，以维持生活。后来，贺军长派到武汉采购军火、药品的杨育又找到了他，他与贺龙恢复了联系，遂借西南大旅社作掩护，为湘鄂西及江湖地区红军购置军火、药品。一九三四年冬，湘鄂西和洪湖地区红军转移，他再

次与贺龙失去联系，便在家人扶持下潜至云南大理隐居。抗日战争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爷爷曾给在陕北的贺龙写信，但未联系上。直到一九四九年冬，残瘫在床的爷爷派我二叔刘冠群到成都会见率军南下的贺龙司令员，二人才又恢复了联系，互有书信往来。爷爷于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因中风病故于大理。在他生前和去世之后，贺龙同志曾派十四军军长李成芳等多次到家中看望、慰问。

爷爷念念不忘追随贺龙出生入死的战斗岁月，生前常向亲友讲述贺龙同志的革命事迹，并将亲身经历和见闻写成笔记。从这些口述和笔记中，我得知贺龙同志的许多轶事，进一步认识了这位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理想与胸怀、追求与奋斗。

“害怕共产主义的只是那些统治阶级”

一九二〇年，贺龙将军在川军石青阳部任旅长，年仅二十四岁。他仪表堂堂，气度潇洒，语言出众，谈笑风生。他朝气蓬勃的生活作风与当时一般暮气沉沉的将领相比，真是天差地别；他洁身自好，艰苦朴素，廉洁严肃，这在那个时代的将领中，也绝无仅有。他非常留意政治，仔细观察每个人的政治倾向，冷静思考别人提出的问题，在荆棘丛生的旷野中执着地探索着革命的道路。时任重庆黔军总司令部上校参军的刘达五有幸与贺龙将军结识，二人志同道合，情好日密。据刘达五讲，那个时候，贺龙最佩服的只有两个人，那就是孙中山和蔡锷。在谈到孙中山时，贺龙对刘达五说过：“我很想见到孙中山。别人说他是孙大炮，中国就需要这样的大炮。清政府怕他，北洋军阀怕他，就因为这门大炮有威力。他

把四万万同胞鼓吹起来，这个威力还小吗？”在谈到蔡锷时，贺龙将军感慨万分：“文武全才，一个了不起的英雄！可惜啊，三十多岁就死了，——外国医院住不得”。

一九二三年，黔军总指挥袁祖铭与川军杨森、刘湘等合伙攻打孙中山任命的四川讨贼军总司令熊克武。刘达五与袁祖铭尽管有八拜之交，但由于政见不合，于是与袁分道扬镳，由重庆买舟东下，欲往广东另谋出路。当时贺龙驻军涪州，刘达五便在涪州上岸会见了。贺龙与刘达五促膝交谈，谈到当时重庆浮图关的激烈战事时，贺龙将军表示了对军阀混战的深恶痛绝。他说：“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吃亏的还是四川的老百姓。中国地方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为什么这么穷，这么弱？就是给这帮军阀、官僚搞烂了！不打倒这些人，老百姓还指望过好日子么？困难啊，这么大一个烂摊摊，哪个能够收拾？”谈到南方革命时，贺龙将军谈出了自己卓绝的见解：“孙中山是伟人，人民是拥护他的。可是光靠嘴巴不行，要有枪。他依靠的还是军阀队伍，早晚是靠不住的。要革命就得有革命的本钱。这不是商人，可以借钱做买卖。”后来他们谈到了俄国革命，贺龙将军说：“听说嘛，沙皇、贵族、地主、资本家统统被打倒了，由工农兵当家，搞共产。我很想知道这个‘产’是怎么‘共’法？它和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有什么不同？中国也有了共产党了。不过我想，不管怎么‘共’，要有产才‘共’得成。干人反正不会吃亏的。”

一九二四年春，任四川陆军第九混成旅旅长的贺龙率军驻扎在贵州铜仁。从广东游历归来的刘达五再次与贺龙会面。刘达五没有留在广东，是因为看到一些军阀队伍骄横跋

庸、腐化贪婪，感到真正拥护孙中山的革命力量还比较弱，革命前途渺茫。贺龙将军却鼓励他说：“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提出了三大政策，这样，他就会得到苏俄、中国共产党和工农民众的支持，情况正在变化。”在贺龙将军盛情邀请下，刘达五担任了贺部参军。同年十月初的一个晚上，细雨纷纷，贺龙将军踱到刘达五寝室，与他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贺龙将军真诚地询问：“达五兄，我们相交几年了，你对我有些什么看法？你认为我走的路子对吗？”他们围绕时局和革命方向谈了许多许多。最后贺龙将军说：“从全国来看，在广州的南方政府是最有希望的革命力量，孙中山提出的三大政策深得人心。拥护孙中山和南方政府，是我们的正确方向。但是 we 和广州没有直接的联系，这些年在政治上让别人牵着鼻子走，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我们应该直接和广东联系。”就在这天晚上，贺龙亲自给孙中山写了一封信，指派刘达五为代表秘密前往广州联系。第二天，刘达五就穿上贺龙将军专门准备的长衫革履，俨然绅士模样，乘船到长沙转粤汉路到广州去了。他与孙中山大元帅府取得了联系，并在广州各处观察，大开了眼界，大长了见识。他在笔记中写到：“由于共产党人出色的工作，广东的群众运动搞得十分活跃，普遍建立了工会、农会、学生会、街头讲演、群众集会、革命的标语口号随处可见。我参观了黄埔军校，印象非常深刻。另一方面，我的确也听到过一些对共产主义的攻击、诬蔑或曲解。每当遇到这些言论时，我就会想起贺龙将军的话：“我们都是干人，什么都不会丢掉的；害怕共产主义的只是那些统治阶级。”

“只要身子正，不怕影子歪”

贺龙将军在黑暗中摸索，在艰难复杂的环境中奋斗，他不但注意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还特别注意斗争的策略，表现出非凡的智慧。

一九二五年，贺龙的部队完全脱离了熊克武、石青阳系统而独树一帜。那时，部队驻扎贵州铜仁，局势复杂，处境艰难。受到四川军阀排挤的黔军总指挥袁祖铭即将率驻川南的黔军退回贵州，是容不得贺龙的。贺部若以数千之众去对抗七八万黔军，无异以卵击石；若与袁祖铭合作，那又是政治上的倒退，为大家所不愿。退避吧，往西走不可能，贵阳方向驻有周西成的部队；到广东去，这虽是贺龙将军多年的愿望，但要通过湘、桂军阀的地盘，军事上难以办到；如果开往湘西，又担心袁祖铭乘势尾随，那时北有吴佩孚，东有唐生智、叶开鑫，这支小小的革命队伍就很难保住了。为了这点革命的本钱，贺龙将军费尽了心机。一九二六年三月，通过对袁祖铭情况的冷静分析，贺龙将军提出了争取袁祖铭拥护广东革命政府，然后与之合作的设想，召集部队主要领导干部讨论研究。贺锦斋认为：“袁祖铭是靠吴佩孚一手扶植起来的，现在要他拥护南方革命政府，掉转枪口打吴佩孚，不可能。”刘达五也说：“我以前在黔军总司令部，劝他不止一次了，他根本听不进去。”贺龙将军于是详细谈了他的看法：“你们说的是过去的情况。现在各方面的情况都变了。吴佩孚南方要防广东革命，北方又要防冯玉祥、张作霖，两面受敌，自身难保。要他空口说白话，封官许愿，那是可以的；要他拿出实力来帮助袁祖铭，已经不可能了。袁

祖铭得不到吴佩孚的实际支持，又受到四川军阀的排挤，只好滚蛋。贵州养活不了他，上云南，下广西都不可能，他往哪里走？袁祖铭是个投机分子，过去在重庆，他曾给孙中山发过电报，请孙中山到重庆，他表示拥护。不管他是真是假，也可以看出他向南向北是五心不定的。现在广东大体上是统一了，南方力量比以前强大得多，北伐的呼声很高，这些袁祖铭不是不知道。他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倒向南方革命，还是有可能的。”对于贺龙将军精辟的剖析，大家无不折服。这时贺敦武又提出一个问题：“跟袁祖铭这样的人合作搞革命，靠得住不？”贺龙将军大笑起来：“他革命，我就跟他合作，他不革命了，我就不跟他合作。腿长在我的身上，不是长在他的身上。”讨论取得了一致意见，贺龙将军即指派刘达五赴重庆去做说服袁祖铭的工作，并交待了方法步骤。刘达五照此执行，果然取得了成功。

一九二六年四月下旬，在争取了袁祖铭之后，为了用实际行动表明革命立场，贺龙将军率部离开贵州铜仁，向湘西进军，走上北伐的前线。由于群众的支持，部队迅速拿下桃源，进驻常德，继而攻下澧州。贺龙将军曾被北京政府封为澧州镇守使，这次从铜仁到澧州，贺龙将军便机智地打着这块招牌。进入澧州后，他风趣地对大家说：“澧州镇守使这块招牌还是有点用处的。我现在就来镇守澧州了”。关于澧州镇守使，贺龙曾数次对刘达五说过：“中国的镇守使多得很，连北京政府都不晓得它封了多少个镇守使。它把你没得办法了，就给你一顶镇守使的乌纱帽。它们要是能把我吃掉，连骨头都咬成碎渣渣了。他们拿我没办法，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当个澧州镇守使吧！我这个镇守使是枪杆子

打出来的，是送上门来的。”

有一天，在镇守使署，贺龙将军叫副官拿出两个匣子给大家看，一个匣子里面是饰有冲天缨的大礼帽和镶边的将军服，还有绶带；另一个匣子里面装有佩刀、长筒大马靴等。

“满神气哩！”贺龙将军微笑着轻蔑地说：“穿上这一套，真是扬威耀武。”大家参观一番后，贺龙将军又说：“找个好的照像师来，照个礼服像，莫要冤枉当一场镇守使，连个纪念都没有。你们都穿上照吧，都来当当镇守使，以后永远都当不成了。”他见大家犹豫，又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只要身子正，不怕影子歪。你们随便哪一个都可以穿上去拍照。这样不值钱的镇守使，谁都可以当。”于是，贺龙将军、陈图南、欧百川、贺敦武、贺锦斋和刘达五，都轮流穿上这套镇守使大礼服照了像，互相赠送，题字纪念。此后这套大礼服就销毁了。刘达五一直保存着贺龙将军赠送他的这张照片，一九五〇年十月，他又将这张照片题字翻拍后回赠贺龙同志。贺龙，号云卿，故照片题字为“云公钧长玉照”。

“政治工作太重要了”

一九二六年八月初，贺龙将军在湖南常德就任北伐军左翼第九军第一师师长。师部新设了两个机构，一个是政治部，周逸群任主任；一个是训练处，刘达五任处长。周逸群是新近由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派来的，和他同来的还有三十几位政治工作人员。贺龙将军热情欢迎周逸群等共产党员的到来，旗帜鲜明地支持他们的工作。由于贺龙将军十分赞赏周逸群，说他“是个很有头脑的人”，又由于周逸群思想敏

锐，善于言辞，态度诚恳，能接近群众，他很快就成了全师官兵欢迎的人物。

部队进驻澧州后，为了充实部队编制和适应战争的需要，贺龙决定在澧州、石门、慈利、常德等县招兵训练。贺龙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周逸群和刘达五，训练处设在澧州文庙内。周逸群和刘达五迅速开展工作，首先约见了澧州县县长鲍勉同，布置了招兵任务。周逸群特别强调，要重视政治宣传，说明北伐革命的意义，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严格禁止拉兵。鲍勉同是一位新上任的非常干练的行政官员，他积极协助，解决了很多具体问题。周逸群很有才能，并注重实干，他亲自到各县去，主持宣传、组织工作。招兵任务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完成了，这对部队的未来起到很大的影响。贺龙将军十分赞赏地说：“了不起的成绩！过去军阀招兵一靠钱，二靠绳子。现在我们招兵全靠讲道理，一个钱不花，农民都把年轻力壮的子弟送来了。政治工作太重要了！”

训练计划是由周逸群和刘达五共同拟定的，但送到师部后遭到参谋长陈图南的否定，他反对训练计划中关于每天上一堂政治课的安排，他说：“战争迫在眉睫，每天的时间，无论是操场，是课堂，还是野外，全部都要用到军事训练上去。”周逸群坚持政治课非上不可，并平心静气地申诉了许多理由。而陈图南却说：“我不听你那一套。”刘达五于是去请贺龙将军来裁决。贺龙将军听了双方意见之后，毫不含糊地支持了这个计划。他说：“正因为马上要打仗，时间不多了，这就更要向士兵讲清楚为什么要打仗，为什么要北伐，为什么要革命。士兵觉悟了，打起仗来才会拼命。要是不晓得为什么打仗，本事再大，又有什么用处呢？有人认

为，我不喜欢政治工作。错了！我贺龙光杆一条，为什么会拖起这么多人来？就因为我讲了政治，我能够唤起民众。孙中山先生不是说过‘必须唤起民众吗’？”

训练完全按计划进行了。政治部派林庸（林空湘）和许蕴石两位共产党员到训练处担任政治科正、副科长，他们极善于做组织和宣传工作，能诗能文，会写会画，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训练处每个星期都安排两次大演讲，请周逸群主任和陈图南参谋长主讲。周逸群讲工人、农民生活的贫困和国家、民族的灾难，分析这些贫困和灾难的根源，介绍广东、湖南的群众运动和北伐战争的形势，还谈到了俄国革命。他讲得通俗、生动、具体，每次演讲，全场都十分活跃。这位年轻的政治部主任是官兵们的好老师，他使大家明白了许多过去没有明白或者还没有想到的道理。贺龙将军除有要事外，也常到文庙听讲。在周逸群演讲的时候，他显然被吸引住了，他常常站起来插话，用他亲身经历的一两个例子，或者讲个笑话去作补充或证明。

贺龙将军经常强调加强政治工作。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中旬，贺龙将军任命刘达五为第一团团长，并调任优秀的共产党员林庸（林空湘）为该团政治指导员。林空湘与刘达五协作共事，成为知交。他们共同努力，使贺龙交给他们的这支精锐部队在思想素质和军事素质上不断得到提高，在北伐战争中打出了声威。一九二七年三月，贺部改编为独立第十五师，在汉口地区接受了武汉国民政府“点验委员会”的点验。第一团是三月十七日在鄂城点验的，点验完毕后，全团官兵齐集长江岸边，留影纪念。刘达五保存的这张照片上有当时刘达五题、林空湘书的对联，上联是“精锐第一团革命

着先鞭”，下联是“留影赤壁岸指日定中原”，横联是“杨维武我。”这是全国唯一保存至今的、参加南昌起义部队的集体照。

“时间是最能考验人的”

在北伐战争中，贺龙的部队北伐河南，保卫京汉铁路，大战逍遥镇，血战小商桥，攻克开封，战功卓著。一九二七年六月，贺部已拥有大量武器装备，兵力发展到近两万人，于是在汉口改编为国军革命军第二十军。贺龙任军长，下辖三个师，还建立了直属炮兵团。贺龙的名声越来越响亮，引起了各方面的注目。

在长期革命斗争中，贺龙将军认准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赞赏和信任共产党员周逸群，任命他为第三师师长。后来他与叶挺、李立三、恽代英、朱德等共产党员结识和交往，尤其是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信任和鼓励，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念。

蒋介石不甘心收买和拉拢这支部队的阴谋的失败，于一九二七年六月再次派朱绍良潜入汉口做说客。朱绍良费尽心机，通过关系向贺龙提出，只要拥护蒋介石，蒋介石就任命贺龙为江西省政府主席。可是贺龙将军大义凛然，不为所动，并已准备伺机逮捕朱绍良。

以参谋长陈图南为首的一批军官，与朱绍良一拍即合。他们最初还希望贺龙将军会跟他们走，后来看到无望了，便决定撕破脸皮，密谋策划发动兵变。

国民党反动派气焰嚣张，国共合作面临着危机，周逸群向共产党员发出了警报。贺龙将军注意到军部的陈图南、柏

文忠、陈策勋等人常到英租界汉口大旅馆的“福字”房间去秘密开会，于是，将刘达五召回军部，告诉他部队里有些人政治上很不稳当，要密切注意，有特殊情况要及时汇报和处理。

当时武汉政府财政拮据，扣发二十军的军饷。尽管贺龙爱护士兵，想方设法保障官兵生活，与部下同甘共苦，但一部分官兵对欠饷仍有怨言。陈图南、柏文忠等便乘此煽风点火，散布流言蜚语，把一些觉悟不高、思想落后的人煽动起来。闹得最凶的是驻在军部附近的第二师第四团，原来的团长就是柏文忠。

贺龙将军觉得有必要亲自向官兵说明情况，便通知四团徒手整队集合。可是陈图南等反动分子认为时机已到，事先布置，让四团全副武装地集合在军部侧面的大智门火车站，并通知他们在各团的心腹准备响应。贺龙将军平时外出从不带大量卫队，但这一天却特别警惕，带去了一个手枪连。在给四团讲话过程中，下面发生骚乱，贺龙将军制止带头闹事的军官，一些反动分子便向贺龙将军开枪射击，哗变发生了。贺龙将军在手枪连的保护下迅速脱离危险区，没等回到军部就采取了果断措施。他派兵到旅馆，逮捕了正在那里等待事变成功消息的陈图南、柏文忠和陈策勋。

事情很快就弄得一清二楚，原来他们准备在打死贺军长之后，由陈图南出来收拾局面，把全军拖出去投靠蒋介石。于是贺军长上报武汉国民政府，请将三个为首分子判处死刑，不久就批准下来了。在报批过程中，一位谷老太爷来向贺军长说情，几次都被贺军长拒绝了。谷老太爷是柏文忠的也是贺龙将军的长辈，他知道上头已经批复后，便跪倒在贺军长面前说：“你要不放柏文忠，我就跪死在你面前，不起来了。”

贺军长把他搀扶起来说：“请你老人家回去休息，我马上就打电话。”谷老太爷出去后，贺军长果然马上打电话，但通知的是“立即执行”！这三个策划兵变的为首分子，便在汉口市济生三马路被当众枪决了。

被枪决的三人是贺龙的老部下，特别是陈图南，长期跟随贺龙，任参谋长，但他们背叛革命，企图整垮革命的队伍。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贺龙将军毫不留情，充分表现了革命的坚定性。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五日，率解放大军南下的贺龙司令员在成都接见刘达五的次子刘冠群时，曾回顾历史，对在场的贺炳炎等同志说：“时间是最能考验人的。有些人在生死斗争面前，害怕了，逃跑了；有些人在荣华富贵面前，叛变了，向敌人投降了。那个时候我的队伍里也有两派：革命派和投降派。斗争是满激烈的。他老子始终跟着我。他和贺锦斋感情特别好，也很佩服周逸群年轻有为。可惜，战争使他残废了，太可惜了。那时候跟我在一起的，到今天没有剩下几个了。”

“钻进大海，还是要翻江倒海的”

一九二七年七月，贺龙将军率领二十军开赴江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贺龙同志担任起义军总指挥，为打击国民党反动派，为创建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南昌起义后，贺龙同志率领起义队伍转战江西、福建、广东，斗争非常艰苦。在广东潮汕，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部队被冲成几段。刘达五率领的第一师第一团与总部失去联系，他们殊死拼杀，兵力损失四分之三，全团只剩下四五百